

修改说明

编号: psysci21-545

非常感谢三位评审人给出的宝贵建议!

我们认真研究了每一条建议,下面我们对每一个建议都逐一作了回复。在正文中,我们根据一些建议做了修改。考虑到正文的字数限制,可能有一些信息、想法、观点无法在文中充分呈现,只能在回复中表达。

评审人 1

1 工作心理理论(PWT)关注环境限制和选择自由度对生涯发展的作用,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为现实中受环境限制的人群才能回应其理论视角。相比于作者所引用的2019年WANG等人的研究,本研究在被试选取以及研究推进上实质性突破不大。

回复:

2019年WANG等人的研究所招募的是城市中的工作者人群。确实,与一些特殊人群相比,比如残疾人、同性恋,本研究和WANG等人的研究采用的样本可能相对“普通”,但是,这一人群在社会资本、社会阶层方面的环境限制上仍然存在差异,也即,自变量有足够的方差,那么对于验证理论模型依然是合理的。

相比于2019年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推进不是体现在被试上,而是体现在其他方面(第3页):

“本研究将基于PWT及其现有的研究进展,采用涵盖多个行业、不同阶层的工作者样本,对PWT的核心假设进行验证,并通过以下途径提供新的信息和知识:(1)本研究即沿用Wang等人(2019)的设计重复验证主观社会地位的效应,又加入家庭年收入作为客观指标,由此探讨究竟是客观的环境限制指标还是对环境限制的感知更能预测PWT模型中的其余变量;(2)将PWT的两个心理资源中介因素同时纳入模型,避免单路径中介导致效应夸大的问题;(3)新增工作意义感为结果变量,探讨PWT视角下社会地位与工作意义感的关系机制;(4)在已有PWT研究无法找到环境限制的缓冲因素的背景下,探索新的调节因素(自我控制)的缓冲作用。”

2 在实证研究时,相比于当下的经济收入或当下主观感知到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刚进入职业生涯时的实际经济收入水平、原生家庭经济负担、教育水平等反映其受环境限制程度的客观指标以及相应的主观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反映环境限制这一构念。而其它资源,如社会支持、自身心理资源(主动性和坚韧性)等,将缓解或突破这种限制对个体带来的消极或不利影响,甚至促进职业生涯发展。这样的研究,各变量所强调的时间点很重要。访谈法或长年追踪研究更利于揭示研究问题。

回复:

我们理解的评审者想要强调的是环境限制这一变量的测量(或者起作用)的时间点。我们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们还认为,环境限制对个体的影响既有长远的影响,也有短期的影响,环境限制既包括远端的环境限制,比如个体的背景属性如性别、民族、农村户口等以及由此引发的歧视,也包括近端的环境限制,如当前的社会资本、感知到的社会地位等。在我

们的研究中，数据揭示的是主观感知的社会地位、个体感知到的选择的自由度，以及个体对自己工作的体面程度、满意度和意义感的主观感知之间的共变关系，用这种共变关系，去支持 PWT 所论述的从环境限制到心理资源（生涯适应力和工作自决力）再到对工作的认知评价（工作体面度）最终到心理结果的预测关系。

这里涉及的变量，除非在生涯转换期，否则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波动很大。所以我们认为，横断模型所能揭示的变量间的关联，足以描述我们所关注的现象的基本状态。

当然，“**访谈法或长年追踪研究更利于揭示研究问题**”这一观点我们非常同意。在讨论部分，我们论述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的设计时，也有提到这点。另外，由于访谈或追踪研究相对横断问卷调查来说，时间精力成本更高，我们认为，横断研究先行、追踪或实验研究跟进，是比较经济合理的逐步推动理论进展的方式。

3 作者所引用 2019 年的研究考虑了社会支持与自身心理资源，要比本研究变量的选择上也更符合这一理论，不仅有个体资源还有社会资源（社会支持），所揭示的意义也更大。

回复：

理论中原本提到了两个环境层面的调节因素（社会支持和经济限制）和两个个体层面的调节因素（批判性意识和主动性人格），但以往的研究都没有报告它们的缓冲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找新的调节因素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只关注个体层面的调节因素，是因为，从应用的角度来说，个体层面的因素更可能由个人来调控和改变，而我们选取自控能力作为调节变量，也是考虑到这是一个可以干预的变量，不仅有已被验证有效的干预方案，而且目前研究者们也还在通过对自控机制的研究产生新的干预思路。所以我们认为，从实践的角度考虑，选择可干预的个体层面变量是更加有意义的。

4 本研究 and 2019 年的研究所提出的调节变量的最终研究结果与假设相反，对此进行深入思考，价值可能很大，但目前思考还不够深入。这提醒作者不能按缓解或削弱消极影响的思路来思考，可能要从个体如何能突破环境限制促进职业发展的思路来阐释与分析。

回复：

感谢评审人的提议。但其实我们并不是按照“**缓解或削弱消极影响的思路**”来思考的，无论是 PWT 提出的 4 个调节变量的假设，还是我们提出的自控能力的调节假设，都是认为这些因素能帮助受制于环境的个体“**突破环境限制促进职业发展**”。只是结果都同样地表明，这些调节变量虽然是有益的，但是对于环境限制低的个体更加有益，而对于环境限制高的个体，其积极作用就打了折扣。

因此在讨论里，对比资源保存理论提出的资源的上升和下降循环，我们把研究结果解释为“资源缺乏会使得其他资源的正面效应不能充分发挥……环境限制对人们的负面影响是非线性的，面临越多限制的人，越难克服限制的影响”（第 8 页），并基于此提出了两点实践建议：“受制于环境限制的人群想要获得好的生涯发展需要付出比优势群体更多的努力；心理学或社会工作实践者们想要帮助他们也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耐心”，以及未来研究的建议“积极因素的积累也许是个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达到一定数量后才会开启资源积累的正向循环；也可能存在决定性因素和辅助性因素的区分，只有保证了某些积极因素的存在，其他积极因素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猜测都还有待未来研究求证，尤其是干预性的研究，以澄清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第 9 页）

评审人 2

1、建议作者在引言部分对研究的关键概念定义清楚，例如“体面工作”的概念界定是什么，体面工作对生涯发展有何意义。

回复：

在第二页中做了如下修改：

“工作体面度的概念来源于国际劳动组织对体面工作的核心条件的描述，包括在身体和人际上都安全的工作环境、适当的报酬、医疗保障、有空闲时间和休息以及工作价值观与家庭、社会价值观的匹配（Duffy et al., 2016）。在 PWT 中，工作体面度作为生涯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决定了个体能否从工作中获得实现感（work fulfillment）和幸福（well-being）。”

2、自我控制作为调节变量提出感觉比较突兀。因为 PWT 理论包含四个调节因素：主动性人格、批判意识、社会支持和经济条件。自我控制与原理论模型中的四个调节因素有何区别和联系？审稿人不认同作者认为 PWT 理论中的四个调节因素都是属于意识层面的因素，因此需要“追求目标的行动能力”这一说法和理由，比如主动性人格和社会支持因素其实也暗含了“积极作为”和善于利用外部支持的成分。并且，也看不出自我控制就是行动能力的体现。因此作者为何会提出自我控制这一调节变量？有何理论贡献？如何调节？这部分的论述有待加强。

回复：

原本正文中提到“这两个调节变量的核心是意识的前瞻性和批判性”，这个说法确实不够严谨。但我们的原意也并非“PWT 理论中的四个调节因素都是属于意识层面的因素”。我们想表达的观点是，理论提出的 4 个调节变量中，**个体层面**的变量有两个，分别是主动性人格和批判意识（而经济限制和社会支持属于环境变量）。主动型人格和批判意识都强调对环境的改变，作者认为，这二者对于生涯发展和目标追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任务选择**的层面（“我看重什么任务？我想做什么？”；deliberative mindset；原先说的“意识层面”是指行动的意图层面，但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任务选择、任务价值评价），比如，具有高主动性人格和批判性意识的人更可能看重和选择“推动积极变革、改变不平等现状”的目标。而自控能力，是个体抵制诱惑、坚持执行目标任务的能力。能在目标任务明确的情况下，保证行动的进度，对于生涯发展和目标追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任务执行**的层面（“我得去行动。我要如何保证任务的达成？”；implemental mindset）。这种任务选择和任务执行相互区别的观点，来源于行动阶段的心态理论（Mindset theory of action phases；Gollwitzer, 2012）。

我们选择自我控制，还有另一个方面的考虑，但由于正文篇幅限制，之前没有写进文中。我们认为，如果环境限制会让人们失去选择的自由度（工作自决力），那么，能有效追求目标、足够自律自控的人，应当能获得更多的自我掌控感和效能感，能积累更多的资源、为自己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不会那么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而且，对于身处环境限制的个体，因为资源和机会的短缺，想去改变环境会比起资源丰富的人而言更困难；但是自我控制是相对独立于外在条件的，即便资源短缺，人们也可能养成自律自控的品质。那么对于身处环境限制的个体而言，自我控制可能会更加有帮助。

关于自我控制的如何起到调节作用，我们在研究设计时就带有两套假设。一个是积极因素具有边际效应的假设，当个体已经具有足够的优势，新的积极因素助益就没有那么强了。这个假设符合 PWT 的观点。但另一反面，从以往研究来看，很可能积极的因素是互相促进

的，环境限制高的个体更不容易受益于积极的因素。于是，作者联系了 PWT 理论的提出者，与其探讨如何行文的问题。对方不建议使用两套假设的行文方式，他建议我们只写符合 PWT 的假设，然后在讨论部分讨论不符合假设的结果。

最终，我们对文中关于自我控制的文段做了如下修改（第 2-3 页）：

“PWT 除了强调环境限制的作用，从实践角度说更重要的是其探索环境限制的缓冲因素这一思路。心理干预更适合在个体层面的变量上进行。PWT 提及的个体层面变量有主动性人格和批判性意识。二者都反映了改变环境、挑战不公平现状的倾向（Duffy et al., 2016）。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支持他们的缓冲作用，Wang 等人（2019）的研究还得到了主动性人格的反作用。这两种积极的品质对生涯发展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目标任务的选择上，比如，更看重和选择“推动积极变革、改变不平等现状”的目标。但目标的选择和执行是两个不同的过程（Gollwitzer, 2012），具有主动性和变革倾向的个体，不一定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尤其是，对于资源不足的人而言，改变环境、挑战不公可能会比社会资源高的人更困难。在环境限制带来的不可控和不确定性中，人们想获得选择的自由感和体面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因素是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抑制或者管理短期冲动、坚持追求长期目标的能力；de Ridder, Lensvelt-Mulders, Finkenauer, Stok, & Baumeister, 2012）。因为，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个体在目标追求过程中会有更多投入和努力，碰到阻碍时会更坚持（de Ridder, et al., 2012），从而在面对环境限制时能更好地应对阻碍并达成个人目标；自控能力强的人有更高的学业工作成就（Converse, Piccone, & Tocci, 2014），从而能获得更多机会与资源，因此能在资源缺乏的环境中也能保有较高的心理资源和工作体面度。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而言，在心理资源和工作体面度上本身就具有优势，自我控制的助益可能相对不会那么明显。因此本研究将自我控制作为调节变量引入 PWT 模型，并假设自我控制能力能缓冲环境限制的负面效应。”

3、为什么选择社会地位作为前因变量，而不是选择其他的经济限制因素作为前因变量呢，需要提供相关理由。

回复：

这次修改中，我们加入了一个个人环境限制的客观指标，家庭收入。在前言最后一段增加了“为什么选择这两个指标”的解释（第 3 页）：

“本研究即沿用 Wang 等人（2019）的设计重复验证主观社会地位的效应，又加入家庭年收入作为客观指标，由此探讨究竟是客观的环境限制指标还是对环境限制的感知更能预测 PWT 模型中的其余变量。”

另外，有关环境限制指标选择的其他观点，请见对第五条评审意见的回复。

4、作者需要对被试招募的过程、渠道、激励方法进行解释说明。样本是来自多样化的企业员工吗？如果是，需要补充被试的其他人口统计学信息，例如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工作和组织等信息。另外，为何没有考虑控制变量呢。

回复：

样本来自网络招募的工作者人群，没有收集关于工作年限和组织单位的信息。职业信息（见下表）描述起来过于冗长，受文章字数所限没有在正文中呈现。正文中已经提到了招募渠道和过程。控制变量方面，由于样本量足够大，各个人口学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平衡，而且模型已经很复杂，所以就没有在模型中加入人口学方面的控制变量。

这次修改中加上了激励方法（“给被试每人 5 元微信红包以示感谢”）和学历信息（第 4 页）：

“高中及以下学历者 65 人（10.73%），大专 117 人（19.31%），二本 140 人（23.10%），一本 151 人（24.92%），硕士 119 人（19.64%），博士 14 人（2.31%）。”

职业	频数	频率	职业	频数	频率
生产人员	24	4.0	文职/办事人员	19	3.1
销售人员	27	4.5	技术/研发人员	58	9.6
市场/公关人员	14	2.3	管理人员	35	5.8
客服人员	7	1.2	教师	198	32.7
行政/后勤人员	50	8.3	顾问/咨询	12	2.0
人力资源	14	2.3	专业人士(如会计、 师、律师、建筑师、 医护人员、记者等)	48	7.9
财务/审计人员	26	4.3	其他	74	12.2

5、由于研究是在同一时点测量的主观社会地位和体面工作，很难分清主观社会地位和体面工作的关系，例如是否存在因果倒置的可能。主观社会地位是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 (Lundberg & Kristenson, 2008)。在比较的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显然是人们比较和认知的基础与根据，诸如收入、教育与职业等反映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获得资源的能力，通常可以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主观社会地位 (Lundberg & Kristenson, 2008; 于铁山, 2015)。也就是说，在个体进行主观社会地位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工作状况的影响。

回复：

我们认为，环境限制和工作体面度的关系是双向的。越是有环境限制的人，可能越难获得好的工作，而工作越不好，环境（资源、机会等）限制可能就越高。但因为 PWT 强调环境限制通过塑造个体内部的认知和心理资源（工作自决力和生涯适应力）从而影响对工作的选择、感知以及由工作带来的心理结果。所以在基于 PWT 的研究里，更关注的是环境对工作的影响。

评审人的观点里，可能还表达了另外一个点，是环境限制因素的作用时间，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在时间上分离开，由早期的环境限制预测后续的工作体面度和心理感受，更能说明因果的问题。确实，这是横断研究的弱点，我们在讨论部分有提及。但横断研究依然能揭示环境限制与工作体面度感知的共变关系，也能描绘出主观社会地位和自我控制对于工作自决力的“优者更优”的交互作用。

另外，主观社会地位毕竟是一种相对的，具有主观意识和经验见识影响的变量，低主观社会地位就一定代表高环境限制嘛？实际上，主观社会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关系不一致的情况经常出现(李培林，2005)。尤其是对于处在社会等级结构两端的群体来说，更容易产生自己所处的实际社会地位与主观认知之间的矛盾，即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偏差 (Sosnaud, et al., 2013)。在 wang 等 (2019) 的研究中使用了客观社会地位进行对比，保证了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有效性，那么，在此文中，作者是否也考虑了客观社会阶层，并比较了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社会地位的一致程度？

回复：

低主观社会地位是否就一定代表高环境限制？我们认为，主观社会地位是对个人的社会资本、能得到的他人支持、社会影响力、社会接纳程度、经济条件等等这些与个体在社会群体中所处位置和所能获得的资源总量有关方面的状况的整体感知，比起具体的个人收入、受教育水平等，主观社会地位更能反映一个人对其环境限制的整体评价。而且我们采用了 Wang 等人（2019）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指标和测量工具，便于重复检验和对比研究的结果。

但只测量主观指标确实无法得知主、客观指标哪个的效应更强，这是很多之前的研究包括 Wang 等人（2019）的研究都存在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有家庭收入这一变量的，所以在这轮修改中，我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作为环境限制的客观指标（比起个人收入，我们认为家庭收入更能体现“环境”属性），与主观社会地位一起作为前因变量纳入模型。最终模型结果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观社会地位对其他变量的预测效应与原本只有主观指标的模型相比差别非常小，自控能力依然是只能调节主管社会地位对工作自决力的预测。在没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家庭收入和主观社会地位一样都能正向预测工作自决力和生涯适应力。

6、考虑到数据收集是通过同一时点被试自我报告的，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作者采用的检验方式并不一定有效，目前很多学者并不推荐用这种方式，建议考虑在研究模型中控制共同方法效应。

回复：

我们在投稿之前就尝试了模型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做法，但正如周浩和龙立荣（2004）提到的加入“加入共同方法偏差潜在变量，增加了需要估计的自由参数的数目，有可能导致模型无法被识别”，我们经过多次尝试和模型调整，加入了共同方法偏差因子的模型都无法收敛。

而且，在模型中控制方法偏差的做法也带来了新的担忧。根据研究者的经验，即便是结构效度稳定且良好的常用的、成熟的问卷，在加入方法因子后，会导致一些题目的载荷骤降，这就意味着，潜变量的得分和分布受到了影响，已经失去了原本应得到的分数，那么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失真。

另外，研究者认为，如果多个变量之中确实存在两两关联，那么从它们的指标中提取的所谓共同方法偏差因子，就不仅代表了共同方法偏差，还包含了变量间共同的特征因素或是潜在的共同前因，而心理学变量之间非常容易有这种情况，这样就导致，研究关注的变量在模型中呈现的关系（特征因子之间的路径）会被低估。

至于我们使用的因素分析法，固然有其弊端，但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共同方法偏差的大小，其数值可以在读者解读研究结果时提供参考，并且不影响潜变量之间原本的关系，算是比较折中的方法。

7、审稿人更关心文章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然而感觉这部分无论是在引言还是讨论中不够突出，例如作者的研究只是单纯地检验了 PWT 理论模型（问题是以往文献是否也做过了类似的实证检验），还是做了哪些理论拓展或深化？作者的研究与 wang 等（2019）的研究（同样是基于中国样本）有何区别或相同点。另外，感觉作者对研究的结论如何有助于指导职业生涯发展和职业生涯指导实践的意义讨论也不够。

回复：

在前言部分，我们加强了对研究贡献的论述（第 3 页）：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基于 PWT 及其现有的研究进展，采用涵盖多个行业、不同阶层的工作者样本，对 PWT 的核心假设进行验证，并通过以下途径提供新的信息和知识：（1）

本研究即沿用 Wang 等人（2019）的设计重复验证主观社会地位的效应，又加入家庭年收入作为客观指标，由此探讨究竟是客观的环境限制指标还是对环境限制的感知更能预测 PWT 模型中的其余变量；（2）将 PWT 的两个心理资源中介因素同时纳入模型，避免单路径中介导致效应夸大的问题，（3）新增工作意义感为结果变量，探讨 PWT 视角下社会地位与工作意义感的关系机制；（4）在已有 PWT 研究无法找到环境限制的缓冲因素的背景下，探索新的调节因素（自我控制）的缓冲作用。”

在讨论部分，原先版本中实践意义分散在了各个文段中，可能不够明显，所以我们重新组织了讨论部分的文字结构（文段过长，敬请查看正文第 8-9 页）。

评审人 3

第一，数据来源自问卷星，且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不大并非排除，这种表述需要修改；

回复：

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提醒。我们已经在正文中做了修改：“可见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较小，可在后续统计中忽略不计”。

第二，假设的提出问题，为什么自我控制一定是削弱作用，而非强化作用，论证需要加强；

回复：

其实对于“为何是削弱作用而非强化作用”这点，我们在研究设计时就带有两套假设。一个是积极因素具有边际效应的假设，当个体已经具有足够的优势，新的积极因素助益就没有那么强了。这个假设符合 PWT 的观点。但另一反面，从以往研究来看，很可能积极的因素是互相促进的，环境限制高的个体更不容易受益于积极的因素。

于是，作者联系了 PWT 理论的提出者，与其探讨如何行文的问题。对方不建议使用两套假设的行文方式，他建议我们只写符合 PWT 的假设，然后在讨论部分讨论不符合假设的结果。

但在这次修改中，我们依然对自我控制的文段做了修改（第 2-3 页）：

“PWT 除了强调环境限制的作用，从实践角度说更重要的是其探索环境限制的缓冲因素这一思路。心理干预更适合在个体层面的变量上进行。PWT 提及的个体层面变量有主动性人格和批判性意识。二者都反映了改变环境、挑战不公平现状的倾向（Duffy et al., 2016）。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支持他们的缓冲作用，Wang 等人（2019）的研究还得到了主动性人格的反作用。这两种积极的品质对生涯发展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目标任务的选择上，比如，更看重和选择“推动积极变革、改变不平等现状”的目标。但目标的选择和执行是两个不同的过程（Gollwitzer, 2012），具有主动性和变革倾向的个体，不一定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尤其是，对于资源不足的人而言，改变环境、挑战不公平可能会比社会资源高的人更困难。在环境限制带来的不可控和不确定性中，人们想获得选择的自由感和体面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因素是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抑制或者管理短期冲动、坚持追求长期目标的能力；de Ridder, Lensvelt-Mulders, Finkenauer, Stok, & Baumeister, 2012）。因为，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个体在目标追求过程中会有更多投入和努力，碰到阻碍时会更坚持（de Ridder, et al., 2012），从而在面对环境限制时能更好地应对阻碍并达成个人目标；自控能力强的人有更高的学业工作成就（Converse, Piccone, & Tocci, 2014），从而能获得更多机会与资源，因此能在资源缺乏的环境中也能保有较高的心理资源和工作体面度。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而言，在心理资源和工作体面度上本身就具有优势，自我控制的助益可能相对不会那么明显。因此本研

究将自我控制作为调节变量引入 PWT 模型，并假设自我控制能力能缓冲环境限制的负面效应。”

第三，作者希望考察生涯适应力的作用，可以将保留生涯适应力和自控力进行比较。

回复：

作者可能没有太理解评审人的意思。这里再稍作说明：

我们确实已经在模型中考察了生涯适应力的作用，它是作为环境限制和工作体面度之间的中介变量。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中介作用。另外，本研究假设自我控制在环境限制和心理特征（也就是生涯适应力和工作自决力）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结果只表明自我控制调节主观社会地位和工作自决力的关系，但不能显著调节主观社会地位（以及后来加入的家庭收入）对生涯适应力的预测。